

《管子》研究

张固也·著

第二辑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

● 齐鲁书社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

第二辑

《管子》研究

张固也
•
著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子》研究/张固也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1

(中国古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

ISBN 7-5333-1602-9

I. 管… II. 张… III. ①法家②管子—研究

IV. B2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8605 号

《管子》研究

著 者 张固也

责任编辑 于春香 桑圣彤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E-mail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13.125

字 数 364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602-9/K·494

定 价 29.00 元

責任編輯

于春香

版式设计

宋悌

桑圣彤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

- 《左传》《国语》方术研究
- 《管子》研究
- 《三国志》和裴注异文研究
- 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
- 宋代馆阁校勘研究
- 荆公新学研究
- 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研究
- 王世贞史学研究
- 二十世纪古文文献新证研究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重点规划项目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邓绍基 刘烈茂 许嘉璐 孙钦善
李修生 宗福邦 周勋初 袁世硕 章培恒
黄天骥 黄永年 葛兆光 董治安 曾枣庄
裘锡圭 阚延河

主 编:安平秋

副主编:杨 忠 曹亦冰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 方一新 卢 伟 安平秋 刘玉才 刘晓东
刘韶军 严佐之 李德山 吴景山 * 陈广宏
陈大康 张玉春 张希清 * 张涌泉 张鹤泉
杨 忠 周国林 * 周绚隆 * 姜小青 * 宫晓卫
* 赵生群 赵伯雄 * 赵逵夫 骆瑞鹤 * 高克勤
贾二强 顾永新 * 顾歆艺 黄仕忠 曹亦冰
董洪利 * 韩格平 喻遂生 舒大刚 * 程章灿
戴建国

(有 * 号者为常务编委)

总 序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是一套学术研究专著。它注重对中国的古代文献(包括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研究和以古代文献为基础对中国文化的探求与思考。其中,有从古文献学的角度进行典籍、文献的专门研究,也有在古代文献、古代典籍研究的基础上,多方位、多视角地审视典籍,审视中国文化,探求典籍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探究它们的结合点。它立足于中国古代的典籍,立足于中国古代的文献,力求体现对古文献研究的特色,倡导一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学风,并且提倡有新的切入点,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推出有质量的,甚至是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这套丛书是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策划和组织。作者队伍的主干力量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 25 所大学的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教学、科研机构中的学者和若干家在全国有影响的出版社的专家。同时,也吸收全国各相关学科的学者的符合于这套丛书宗旨的学术研究专著。

这套丛书的书稿将在编委会、学术委员会和出版社分别审定合格之后分批推出。

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联合出版这套丛书。在此谨致真诚的谢意。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3 年 4 月 15 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管子》研究的新思路	21
第一节 《管子》早期流传考	21
第二节 《管子》分组之义蠡测	40
第三节 《管子》古本之推测	48
第四节 《管子》应作分组研究	58
第二章 论《经言》为管子学派之早期经典	65
第一节 《经言》为管子学派之经典	65
第二节 《经言》著作年代商榷	71
第三节 从《经言》论管仲思想特征	127
第三章 论《外言》与管子学派之初步发展	142
第一节 《外言》承前启后之地位	142
第二节 《外言》著作年代之推测	152
第三节 《外言》为齐法家形成之标志	164
第四章 论《内言》为桓管历史之述论	176
第一节 论“三匡”	177
第二节 论《霸形》、《霸言》	201
第三节 论《问》篇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210
第四节 《戒》篇非战国末叶之作	223
第五章 《短语》之分类研究	233
第一节 《地图》、《参患》、《制分》	234
第二节 《君臣》上下、《小称》、《四称》	241
第三节 论《侈靡》篇	246
第四节 论《心术》等四篇的著作年代	275

第五节 《水地》、《四时》、《五行》·····	286
第六节 《势》、《正》、《九变》·····	294
第六章 从《区言》看齐法家思想之发展·····	300
第一节 “三法”说质疑·····	300
第二节 《区言》中的法家思想·····	307
第三节 《区言》受秦晋法家思想之影响·····	313
第七章 读《杂篇》札记·····	319
第一节 《封禅》略说·····	319
第二节 《小问》中的桓管问答·····	322
第三节 《七臣七主》为战国晚期法家作品·····	326
第四节 《禁藏》错简新考·····	329
第五节 《九守》与形名法术之学·····	334
第六节 《度地》作于战国·····	339
第七节 《地员》与“相地衰征”·····	342
第八章 论《管子解》·····	351
第一节 《管子解》的文体特征·····	351
第二节 《管子解》为战国晚期齐法家作品·····	356
第三节 从《管子解》看齐法家兼融儒家思想·····	365
第九章 论《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	370
第一节 《轻重》作于汉代之前 ——从文献上证明 ·····	371
第二节 《轻重》作于战国中期以前 ——从理论上证明 ·····	380
第三节 《轻重》为管子学派早期作品 ——从与《经言》等篇的关系证明 ·····	387
结 语·····	397
参考文献·····	403
后 记·····	410

绪 论

《管子》是一部珍贵的古代典籍,但与多数先秦诸子书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这部书旧题春秋初齐相管仲撰,既不像假托远古人物的著述,汉人已知其为六国时人之作;也不像春秋末叶私学兴起后的晚周诸子,基本可以确定为某人或某家的著述。二是它的内容和思想相当丰富,按传统的诸子分类,它兼有儒、道、阴阳、法、名、兵、农诸家之说;按现代学科分类,它包含了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军事、农学、教育等各种思想。因此,这部书的真伪问题很早就被人提出来,宋代学者已经形成“《管子》非一时一人之作”的公论。但具体到各篇的著作年代,则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给进一步研究它的思想,以至先秦学术思想史,都带来极大的困难。“从学术史角度来看,《管子》仍然是诸子范围中有待开拓的园地,许多疑难问题,迄未得到理想的解决”^①。本书试图在吸取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管子》一书的著作年代问题作点新的探索。下面首先就前人的研究概况略作回顾与评述,以作为本书的绪论。

战国末叶至西汉初期,先是法家学说盛极一时,后是黄老道家大行于世。《管子》一书中,这两种思想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在当时相当流行,当然也就没有人去怀疑它的真伪。如刘安《淮南子·要略》篇明言:

^① 胡家聪《管子新探》李学勤序,第6页。

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管子》对于朝廷中许多当政人物仍有相当的影响。随后，在昭帝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它的思想受到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的猛烈批判。当时贤良文学们并没有对此书本身提出怀疑，但他们的观点对以后的辨伪学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晋人傅玄就把怀疑的目光首先瞄准了《轻重》篇，他说：“《管子》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其《轻重》篇尤复鄙俗。”^①这是见于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对管仲的著作权问题提出怀疑。此后直到唐代，虽然有些类似的说法，如孔颖达说：“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所录”^②，但未能提出更多的论据，在总体辨伪水平上并无显著提高。

北宋刘恕在引述傅玄之言的同时，还据《管子》书中皇、帝、王、霸并提，又称五帝三王，认为它“杂孔子后人之语，校其岁月，非本书也”。他第一次根据书中的特殊概念来辨伪，这在研究方法上是一大突破。但他大体上仍然相信其为“管氏之书”，认为“其术类商鞅，其言如韩非，其宽厚旷大则过之”^③。自孟子羞称齐桓、晋文之事，后世学者往往以管、商、申、韩并谈。虽然汉代书目分类将《管子》归入道家，但稍后的曹魏时人刘劭却说：“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

① 刘恕《通鉴外纪》卷一引《傅子》，第27页。王应麟凡三引《傅子》，皆作：“《管子》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分别见《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六，第3页；《困学纪闻》卷十，第22页；《玉海》卷五三，第21页。

② 孔颖达《左传正义》（庄公九年），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1766页。《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一：“杜佑《指略序》云：‘唐房玄龄注。其书载管仲将歿，对桓公之语，疑后人续之。’疑杜佑仅言及注者，其下辨伪之语为晁公武所自出，标点有误。

③ 刘恕《通鉴外纪》卷一，第26页；卷五，第12页。

仲、商鞅是也。”^① 梁、唐以下的历代书目也都直接将其归入法家。儒家学者对法家著作本来就持批评态度，宋代由于王安石变法受到士大夫们的激烈反对，法家著作也遭到更多的排斥。刘恕之说出于变法之际，已寓有归咎《管子》为法家先驱之意，但还没有直接说书中有战国法家之作。不久以后，苏辙就明确地提出：“管仲既没，齐国因其遗业，常强于诸侯。至战国之际，诸子著书，因管子之说而益增之。其废情任法而远于仁义者，多申、韩之言，非管子之正也。”^② 这一说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南宋初期的浙东学者叶适是古代对《管子》论述最为丰富而深刻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的“《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这一著名论断，至今仍被学界视为不刊之论。他说：

管仲始以盐策霸齐，余常疑《左氏》所不载，而《管子》书乃诸子辩士刻薄揣摩者附会其说，非实事也。是时王道虽衰而未尽，圣贤余论尚存，若管子果夺商贾之利，以自封殖，议者安肯赦之？且陈氏盗齐柄，盖以家量贷，以公量收，晏子谓民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然则豪夺民利，非管氏所为决也。

《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又持满定倾、不為人客等语，亦种、蠡所遵用也。……其书方为申、韩之先驱，斯、鞅之初觉，民罹其祸，而不蒙其福也，哀哉！……盖先王之泽竭，师友学尚不复继，士以私智窥测，自立言议而被以管子之名，徒众多，传授广，于时孔、孟、子思之论未行，学士、诸生以是书为教者，视《六经》无有也。……所以为《管子》者，在《三匡》二卷，杂乱重复，叙齐襄公被弑，鲁桓公见杀，皆与《左氏》不异。然此书所有者，《左氏》无不有，而复重杂乱者，《国语》尽削除以就简一。明此书之出在《左氏》后，《国语》之成

① 刘劭《人物志·流业》，第10页。

② 苏辙《古史》卷二五《管晏列传》，第2页。

在此书后也。^①

与叶适同时的另一学者韩元吉,明确提出《管子》多为“战国游士之术”,出于“稷下之邑”。其说甚详,今录其要于下:

《管子》之书,战国游士之术也。孟子曰:齐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则仲之与桓公平日谋国议政者,其亦详矣。然举而著之书者,则齐国之士也。当是时,齐有稷下之邑,盖亦是尧舜、非桀纣,谈道德而言仁义,虽仲之作内政以寓军令,在于强兵富国而霸齐,今其书则尚权术,务笼络,要以愚其民而用其力,驳杂为甚,已有战国之风,不知仲之说果若是乎?故吾意其为游士之术也。^②

南宋时期关于《管子》的评论还有很多,如叶梦得认为:“其间颇多与《鬼谷子》相混,管子自序其事,亦泛滥不切,疑皆战国策士相附益。”朱熹指出:“《管子》之书杂。管子以功业著者,未必曾著书。如《弟子职》之篇,全似《曲礼》。……《管子》非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闲工夫著书底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其书老、庄说话亦有之,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他书。”黄震则说:“《管子》书不知谁所集,乃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之手。……《心术》、《内业》等篇皆影附道家以为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斫隐语以为怪。管子责实之政,安得有虚浮之语。”^③ 以上诸家都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值得重视。

综观宋人的辨伪言论,已经从《管子》书中提及管仲、桓公之死和

①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二,第620页;卷四五,第663—668页。

②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六《读〈管子〉》,第38页。

③ 分别见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六,第3页;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七,第1、2页;黄震《黄氏日抄》卷五五,第14、15页。

后代的人名、地名,思想内容多有与管仲的时代和身份不符之处,文字有杂乱重复等多种角度,论定了其全书不出一时一人之手。但必须注意到,宋人实际上是在承认书中有管仲的著述、主要反映管仲思想这一前提下,针对书中的部分篇目和内容来作辨伪的。如黄震在上引诸语后又说:“管子之情见于《牧民》、《大匡》、《轻重》之篇”,《牧民》是“管子政经之纲”。朱熹说管仲不是著书之人,似疑之最甚,但他又说:《弟子职》一篇,“窃疑是他作内政时,士之子常为士,因作此以教之。”^①另外,宋人只是怀疑有管仲以后之作,但具体所指的时代尚未太晚。如叶适将其成书年代定在《左传》、《国语》之间,即春秋末叶至战国初年。多数学者认为其中有战国作品,但很少明说为战国末年的。同时,还有些学者对部分辨伪论据作出了新的解释,如叶适所提出的“其言毛嫱、西施”,张邦基辩解说:“岂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为名耶?是有两西施矣,而毛嫱亦非越王之美姬明甚。”^②

元、明、清时期的《管子》辨伪继宋代之后有所发展,参预的学者更多。但往往援引宋人旧说,然后附加评述,在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上并无太多建树。明朱长春首次把《管子》一书与“稷下大夫”联系起来,并认为有“秦先周末之文”,较有特色,他说:

周衰道拙,至雄国而祖霸贱王太甚,天下有口游谈长短之士,都用社稷。管仲为大宗,因其说系而附之,以干时王,猎世资。田齐之君,亦自以席桓公、敬仲祖烈为最胜,夸一世而存雄。故其书杂者,半为稷下大夫坐议泛谈,而半乃韩非、李斯辈袭商君以党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故其书有春秋之文,有战国之文,有秦先周末之文。^③

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仍然经常强调书中有管仲的著作。如朱长春

① 朱熹《朱子语类》卷七,第8页。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曾略引其说。

②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七,第2页。

③ 朱长春《管子榷·序》。

又说：“《经言》管氏之本宗，大较《外言》以下贗鼎过半。”清初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没有把《管子》列为“全伪之书”，而称之为“有真书杂以伪者”，最能代表晋唐以来学者的总体看法。《四库全书总目》也说有管仲“手撰”及后人述说之别，只是不易区分而已。方苞说管氏之书是“众法家所附缀而成，且杂以道家之说，齐东野人之语”，疑之较深，但毕竟肯定了其“掇拾近古之政法”，只是“其本真盖无几”^①。日本学者安井衡说得更为具体：“《经言》九篇盖成于管敬仲之手矣，故尊称《经言》，《外言》以下则承其学者述之”，其中有“亲炙管子者所述”，也有成于再传、三四传之后者^②。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先秦古书的认识不断深入，清代有些学者提出，先秦诸子不必手撰，因而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伪书。如章学诚说：“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公之谥。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③严可均说：“近世编书目者谓此书多言管子后事，盖后人附益者多，余不谓然。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不必手著。”^④这类观点继承了朱熹的思路，但更明确地将《管子》视作与其他诸子同样的学派著作，目的在于肯定其与管仲思想有关。这与明、清时期诸子学逐渐升温，对《管子》的评价有所提高的大背景有关。特别是明、清两代后期，内忧外患不断加剧，士大夫们急于从古书中寻找救世良方，都把目光瞄准了《管子》。明赵用贤说：“王者之法，莫备于周公；而善变周公之法者，莫精于管子”，“故其书如《牧民》、《乘马》、《幼官》、《轻重》诸篇，大抵不离《周官》以制用，而亦不尽局于《周官》以通其变”^⑤。晚清学者更以为，

① 方苞《方望溪全集》，第42页。

② 安井衡《管子纂诂·序》。

③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诗教上》，第62页。

④ 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书〈管子〉后》。

⑤ 赵用贤《管子序》，见戴望《管子校正》卷首。

“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①，所以主张“居今日而求振兴，惟《管子》一书最切当世之用”^②，纷纷到《管子》书中去寻找管仲富国强兵之道。

总之，从晋、唐直到晚清，虽然许多学者指出过《管子》非管仲一人所著，而有后人的作品窜入，但是根本否认书中有管仲的著作者并不多见；即便怀疑为后人所作的部分，仍大多被视为春秋战国时人传衍管子之绪余，而不是与管仲思想毫无关系的，其写作年代也还没有被推断得太晚。职此之由，对于《管子》书中有些文句与晚周诸子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古人大多认为是后者本于前者，而非相反。最近十多年来，有些论著在综述《管子》研究概况时，往往从古今诸家之说中取其主要言论，分成管仲遗著说、部分遗著说、非遗著说等^③，俨然古人已有完全否认《管子》与管仲之关系的说法，抹杀了古今之说的根本区别，其实是不妥当的。

二

清末民初，疑古之风与西学东渐相互激荡，中国古代文献考证和古史研究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术界对《管子》一书的主流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标志是胡适先生在1919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其中说：

《管子》这书，定非管仲所作，乃是后人把战国末年一些法家的议论和一些儒家的议论和一些道家的议论，还有许多夹七夹

① 张履《续书〈管子〉后》，薛福成《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转引自罗检秋《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第53、75页。

② 张佩纶《管子学》，第2745页。

③ 张荣明《管子研究的回顾与探索》，见《大庆师专学报》1988年第4期，第64—70页。王德敏、刘斌等《管子十日谈》，第3—5页。池万兴《管子研究》，第18—22页。

八的话,并作一书。又伪造了一些桓公与管仲问答诸篇,又杂凑了一些纪管仲功业的几篇,遂附会为管仲所作。^①

有些论著将这段话与晋、唐以来的辨伪言论并列引用,不太注意其间的差异。近年胡家聪先生在《管子新探》一书末附录古今学者关于《管子》的评论,竟然没有引用此说,似乎未能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和影响之深远。实际上,这短短几十个字深堪玩味。胡适先生的研究方法和目的,主要不是通过书中有管仲身后之事等来辨别出后人伪造的篇目或内容,而是根据所谓“学说先后演进的次序”来认定全书主要是“战国末年”法、儒、道等诸家的议论,而桓管问答诸篇也是此时“伪造”的。这样一来,《管子》书中除杂凑了一些记载管仲的历史和传说外,不但没有管仲的作品,而且与管仲本人的思想几乎就没有关系了。这与前人在肯定《管子》一书与管仲本人及其思想有关的前提下的辨伪言论是有本质区别的。黄云眉先生说胡适“祖陈(澧)说而勇于断制,足以破姚(际恒)氏真伪相参之疑矣”^②。其实晚清陈澧说《管子》“一家之书而有五家之学”,但至少仍然相信《史记》所引为管仲“最精醇之语”,其驳杂者乃后人“附于《管子》书”^③,这也可归入真伪相参之说。把《管子》所有篇目都当作战国末年的伪作,这可以说是典型的胡适式“大胆假设”。

这一关键性转捩及其影响,从梁启超先生前后观点之变化可以更清楚地反映出来。1909年,梁启超在其名著《管子传》中仍然基本肯定司马迁之说,因而认为:

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1页。按:胡适1916年6月在《留美学生季刊》发表的《读〈管子〉》,论述较详,但影响不如此书之大。该文乃针对梁启超《管子传》而发,明确反对“以《管子》为齐稷下诸生衍管子绪余之作”。见《胡适书话》,第265—269页。

② 转引自戴浚《管子学案》,第25页。按: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初版于1932年,建国后三次重版,已删去提及胡适的字句。

③ 陈澧《东塾读书记》,第235页。